

論班孟堅「山西出將」說

楊兆貴

摘要

班固於《漢書·趙充國辛忌慶傳贊》說：「山西出將」，指明西漢「山西」地域多出將軍。這是班氏以人文地理的觀念闡論地理與產出將軍的關係，然而班氏只指陳這一史實，而未深入闡述其故。本文根據時賢的看法，先釐清山東、山西的地理範圍，進而從經濟、自然地理角度闡論「山西」的農業、經濟發展之故；再而從人文、歷史地理觀念論述此區域民風、多出將軍之由，這亦與秦人在此區長期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這部分主要論述秦人長時期與周、戎交雜的關係並形成尚武精神。

關鍵詞：班固、山西、將軍、自然經濟地理、人文歷史地理

* 楊兆貴現職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一、緒論

《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曰：

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辛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¹

班固（32-92）在此段提出秦漢以來一個現象，即所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說明山東、山西所出的人才有別，並從人文歷史地理的角度，解釋人才與地理的關係，其大意是某一時期的政治人才、軍事人才與其所生長的地域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某地域的歷史、文化若有某些人文趨向與特性，則由此地域所薰陶而產生的人才亦有該種文化的氣質與特性，且此一文化特質亦會陶鑄、影響、限囿其人才的特長。可見，人才與地理的關係相當密切。²班固特就「山西出將」這一現象以人文歷史地理觀念闡釋。班固認為，漢代「山西」出將，還因山西地域與羌胡相雜，山西百姓為求自衛，且與羌胡相處日久，因此民風漸浸養成好武尚力。此風俗由來有自，自秦人從周代居此就已逐漸養成。這樣，此區域所產出的人才，都具有其俗尚武勇戰的特點，又適逢武（西元前 141-87 在位）、宣（西元前 74-48 在位）用兵匈奴等外敵，因此一時軍事人才濟濟，均以勇戰顯功於朝、名稱於世。班固的看法，固為允愜。本文主要承班氏之意，參稽史乘，以自然經濟地理、人文歷史地理的觀念，闡釋山西能出將之故，至於其他與得將有關的制度及諸細節方面，非本文所能詳論，故略。

¹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4690。本文《漢書》引文都引此書，為省篇幅，直接在引文後加頁碼。

² 筆者已發表班固「山東出相」說一文，詳楊兆貴：〈論班孟堅「山東出相」說〉，《中華文史論叢》第 57 輯，頁 166-204。

二、西漢山西的地理範圍

要討論西漢山東、山西，則先釐定其地理範圍。傅樂成、邢義田、王子今等先生各有專文論述。³一般而言，學界認為山西或以華山、崤函為界，或以太行山為界。

山東、山西的地理範圍又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山東包括《漢書·地理志》所說的青州、徐州、豫州、兗州、冀州、并州、揚州、荊州，山西包括司隸、益州、朔方、巴蜀。狹義的山東指能在政治、文化發生重要作用的區域，即黃、淮、海一帶，因此勞榘先生（1907-2003）以為山東的核心範圍應不包北方邊郡（包括西北邊郡如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南邊以淮河為界，除去荊州、揚州，而以青、冀、兗、豫、徐諸州為重。⁴按據西漢史實，山東的核心範圍誠如勞先生所言，因為長江以南，氣候「卑溼，丈夫早夭」，⁵「一直到西漢初期，長江流域還是地廣人稀」，⁶因此中原人士避之猶恐不及，⁷且農業發展不及黃、淮一帶，⁸所以長江以南、南楚一帶，終西漢一代，未能在政治、文化、經濟上產生重大的作用。

山西的地域，筆者認為主要範圍即《漢書·地理志》所說的秦地，包括今陝西、甘肅、青海（詳下文）。⁹雖然勞先生批評北方諸郡地曠人稀，其

³ 傅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收於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1977年），頁65-80。文中也論述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說，但稍簡略。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收於邢義田：《秦漢史論稿》（臺北：三民書局，1987年），頁95-119。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上編有〈長安五陵的文化繁榮與關中區文化領導地位的形成〉、〈北邊區的軍事文化〉兩文討論關中、北邊兩區域的不同文化，但他沒給北邊區劃下具體的地理範圍。另，書中另一篇〈「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秦漢人才的區域分布〉羅列自漢高祖以來28位將軍及其居住地、籍貫，肯定班固「山西出將」說。（頁253-256）筆者認為該文所引人數有限、時間過長（由高祖開始至成帝），另外，作者只從區域文化特點簡單說明山西出將之故，如說「山西多猛」、「多悍勇」。（頁256-257）。學者對「山」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如錢坫認為「以華山為界也。」（頁2825）學者或謂山東山西以「關」為界，王先謙說：「漢世謂關外為山東。」（頁2873）另謂「關」指函谷關，或指潼關。

⁴ 勞榘：〈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之第2分（1935年），頁183。

⁵ 司馬遷：〈貨殖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268。

⁶ 陳良佐：〈自然環境對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影響〉，收於《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頁772。

⁷ 賈誼可作為這方面的代表。《史記·賈誼列傳》說「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適」，韋昭云：「謫也。」（司馬遷：《史記》，頁2492-2493）賈誼「意不自得」，其原因之一是「長沙卑溼」，氣候差劣是他心情憂鬱的一個原因。

⁸ 王子今：〈秦漢氣候變遷與江南經濟文化的進步〉，收於《秦漢史論叢（第6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23。

⁹ 秦地的地理範圍見《漢書·地理志》。學者對北地六郡有不同的看法。朱一新之見比較符

重要性只有防邊一途，¹⁰然而北方諸郡「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頁 2824），在漢代的漢、匈、羌等關係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孫子（約西元前 545-470）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¹¹說明將領、地理因素在整個國家的政治、國防事務上的重要性。地緣政治、軍事也是政治、外交、軍事上的重要環節。漢代自高祖（約西元前 256-195）以來，朝廷就受到來自北方民族的壓力。漢武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征服以匈奴為首的北方民族。北方邊防在漢廷國策上有重要的分量。¹²在國防軍事方面，將軍起著極重要的作用。西漢如此，東漢亦復如是。¹³漢代出現了不少流芳千古的名將。我們有必要正確看待地緣、將軍、邊防、漢廷等的相互關係。

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提到的西漢諸將軍，分別來自郁郅、義渠、成紀、上邽、襄武、狄道，分屬北地、天水、隴西諸郡。他說「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可見，〈贊〉所提到的「山西出將」是就這幾個郡而言的，也就是「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而言，其範圍比上述地域（秦地）小。與這四郡民俗相近的尚有上郡、西河，〈地理志〉把這六郡歸於秦地，且一起評它們的民風：「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頁 2824）然而班固在〈贊〉裡沒是到上郡、西河，可能另有原因。¹⁴

三、論班固提到的西漢諸將軍

（一）論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提到的將軍

欲分析山西諸將與地理的關係，先分析〈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提到的幾位將軍。這些將軍包括：郁郅王圍（生卒年不詳）、甘延壽（生卒年不詳），義渠公孫賀（?-西元前 92）、傅介子（?-西元前 65），成紀李廣

合史實（頁 4655、4656 註 3）。

¹⁰ 勞幹：〈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頁 191-192。

¹¹ 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2。

¹² 學界對地緣軍事的研究比較少，近來有這方面的研究，可供參考，見賈文麗：《漢代河西軍事地理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¹³ 如東漢崔寔桓帝時任五原太守，整飭軍馬，嚴守邊防，致使連年侵擾雲中、朔方的少數民族不敢犯。百姓免於擄掠殺害及徙離之苦。崔氏保障邊區安定之功「常為邊最。」參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730。

¹⁴ 原因可能是這兩地區沒出過將軍。查《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所記諸將軍，其出生地域沒有來自上郡、西河郡的。詳下文。本文「四郡」指天水郡、隴西郡、安定郡、北地郡。「六郡」指「四郡」及上郡、西河郡。

(?-西元前 119)、李蔡(?-西元前 118)，杜陵蘇建(生卒年不詳)、蘇武(西元前 140-60)，上邽上官桀(?-西元前 80 年)、趙充國(約西元前 137-52)，襄武廉褒(生卒年不詳)，狄道辛武賢(生卒年不詳)、辛忌(生卒年不詳)。

班固提出「山西出將」說，並舉這幾位為代表，他們是否都是將軍？西漢一朝實則並無固定的常設將軍，以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及前、後、左、右將軍等位高權重，「位上卿，金印紫綬」(頁 867)，且比較常見。武帝元狩 4 年(西元前 119)以大司馬冠將軍，進一步提高其地位。大司馬所冠的將軍包括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昭(西元前 87-74 在位)、宣以後，大司馬將軍領尚書事，權位最重，往往成為最高決策者。¹⁵查《漢書》傳記，班固所提的這些人絕大多數當過將軍，只有傅介子、甘延壽未曾當過(不過，甘氏當過的長水校尉是武帝時設置的八大校尉之一，地位也很高。¹⁶下文為行文方便，皆稱將軍)。可見，班固所說的「將」不一定指武官系統裡官階最高的大將軍、驃騎將軍等，而指曾經帶兵參戰的武將。

又，這幾位將軍絕大部分生活在武帝、昭、宣、元(西元前 48-33 在位)、成(西元前 33-7 在位)時期，而非漢初，只有李廣曾在文(西元前 180-157 在位)、景(西元前 157-141 在位)時打仗任職，在景帝時任過騎常侍、騎郎將。可見，班固提到的這幾位將軍都生活在漢武以後。易言之，班固是說漢武及其後時期，漢朝攻伐匈奴、羌胡等邊境民族，才出現「山西出將」這現象。

可見，班固所提到的幾位，一則他們不一定是屬於高階層的將軍，¹⁷肯定不是武官系統最高位階的將軍；二則他們多生活在武、昭、宣、元、成時期，並在這一時期建功立業；三則他們都是山西四郡人。

循班氏的思路，山西地域與將軍有密切的關係。如果一個地域在一段歷史時期湧現很多將軍，這除了與地域思想、文化、習俗、歷史等方面有關係外(詳下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論述部分)，還與生長於此地域而成為將軍的個人經歷有關。一個人能成為將軍，必然在從軍打仗過程中建立不

¹⁵ 張金龍：〈西漢將軍制定述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 年第 4 期，頁 11-14。

¹⁶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提到武帝時設城門校尉、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凡八校尉，秩皆二千石。所以，長水校尉宜是一地位高的武官。

¹⁷ 《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武官系統只羅列太尉(武帝時改為大司馬)、列將軍、水衡都尉三種職官，列將軍包括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左將軍、右將軍、前將軍、後將軍。

少功勳，且要有際遇，¹⁸也可能與他的家族家風有關。當他成為軍隊頭目，成為舉足輕重的軍事人物，他希望後代能繼承他的志業，應該重視家庭教育。這樣，這一家族就會陸續出現參軍、成為軍隊頭目的現象。漢代曾出現經學世家，軍隊也會出現，¹⁹只是這方面的史料較少，但我們可從這些史料而可推測。為了對此現象有較深入了解，下文根據《漢書》各傳簡論他們生平的相關事蹟，從出生地或籍貫、任職經歷、曾參與的較有名的戰役、家庭教育、後代任職等方面介紹。其中李廣、蘇建、趙充國、辛慶忌四人及其家族，由於戰功彪炳，且《漢書》記載較多，可作為代表而加以論述。

1. 李廣及其家族

李廣，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縣）人。他生於軍人世家。（頁 3935）他的先祖李信（生卒年不詳）是戰國時秦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²⁰李廣出身良家子，²¹先後任郎、騎常侍、（以下景帝時）驍騎都尉、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雲中等地太守、（以下武帝時）未央衛尉、驍騎將軍、將軍（繼被貶為庶人）、郎中令、大將軍衛青（?-西元前 106）之前將軍。元狩 4 年（西元前 119）他「與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衛青「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頁 4001）

李廣常常打敗仗，未立軍功。雖然這樣，李廣很受士兵尊敬。他有自己的帶兵打仗的特點：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頁 3938-3939）

¹⁸ 李廣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文帝感慨說：「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頁 3935）

¹⁹ 蔡海燕：《隴西李氏家訓及其當代家庭德育價值研究》（西安：西安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3.1.1「隴西李氏淵源」論述了先秦李氏至李廣的家族譜表。可見李廣家族淵源流長。藍永蔚：〈飛將軍李廣和他的家族〉（《文史知識》1987 年第 8 期）則論述了李廣及其兒子的事蹟。可見，隴西李氏家族是軍事世家，應是事實。

²⁰ 司馬遷：《史記》，頁 2339。

²¹ 有關西漢六郡良家子的具體情形，詳杜志強：〈「六郡良家子」考論〉，《歷史文獻研究》總第 34 輯，頁 258-268。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廣啗口少言……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頁 3946）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頁 6289）

李廣與程不識治軍不同，與兩人的性格有關：李廣為人豪邁，待人寬厚，常常為士兵著想，治軍簡要，不喜用繁瑣的紀律來約束士兵。雖然他對士兵的要求不如程氏嚴格，但是憑著他的崇高威望使軍隊形成向心力，他「這一套不正規的治軍方法非常適合於塞外的地理條件和敵情條件，他的部隊簡單、機動，長於應變，所以匈奴非常害怕李廣的簡單」。²²

李廣重視家庭子弟軍事培養。他的三個兒子都從軍：大兒李當戶，任郎，「上以為能」（頁 3950），可惜早死，有子李陵（？-西元前 74）。次子李椒，曾任代郡太守。三子李敢，曾先後任郎、長校、裨將、關內侯、郎中令。李敢元狩 2 年（西元前 120）夏天隨父出右北平，被匈奴包圍，「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頁 3943）他英勇善戰，曾以校尉身分「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關內侯。」（頁 3950）可見李敢是一位有勇有謀之將，有乃父之風，可惜後被霍去病（西元前 140-117）射殺。李敢的兒子李禹，亦有勇，可惜貪財好利。（頁 3950）這點剛好與李廣相反。

李陵是李廣的孫子。他曾任侍中建章監、騎都尉，天漢 2 年（西元前 99）投降匈奴。他帶兵打仗，「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頁 3951），與李廣相同。他任騎都尉期間曾訓練五千荆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頁 3952）「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頁 3952）可見李陵重視培養勇士。李陵後來投降匈奴，故舊門下及隴西士大夫都以此為恥，這個延續百年、名將輩出的軍人世家當時衰敗了。

李蔡（？-西元前 118），李廣之弟，曾先後任郎、輕車將軍、樂安侯、丞相，後因「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頁 3950），在元狩 5 年（西元前 118）自殺。²³

可見，李廣家族素來重視軍事培養，所以自秦國李信開始，一直到李廣之孫李陵、李禹，幾代人都英勇善戰。雖然史書沒記載他們引用兵法，但相信他們作為軍事世家，不可能不讀兵書。又因他們是軍人世家，地方社會尊重他們，可能受他們影響，不少人喜歡從軍。

²² 藍永蔚：〈飛將軍李廣和他的家族〉，頁 74。

²³ 有關李蔡之死及漢武帝時用相情況，參拙作：〈論班孟堅「山東出相」說〉，頁 172-173。

2. 蘇建、蘇武父子

他們是杜陵人。蘇建曾任過校尉、衛尉、遊擊將軍、右將軍、代郡太守、中郎將。他有三子：長子蘇嘉，曾任奉車都尉；次子蘇賢，曾任騎都尉；三子蘇武，元朔元年（西元前 128）跟衛青出雲中，攻隴西，走匈奴，建朔方郡，被封為平陵侯。可見蘇建父子都從軍。蘇武天漢元年（西元前 100）與張勝等出使且鞮侯單于，因張勝參與匈奴叛亂事件，蘇武受累被扣，兩次想殺身成仁，不辱君命，都沒成功。他後來被流放到北海，昭帝始元 6 年（西元前 81）才回長安。他的行為、事蹟歷來深受讚頌。如班固評說：「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頁 3978）²⁴

3. 趙充國及其家族

趙充國，隴西上邽（今甘肅天水市）人，六郡良家子。²⁵他先後擔任過羽林、中郎、車騎將軍長史、大將軍護軍都尉、中郎將、水衡都尉、後將軍、長信少府等。

趙充國曾跟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元前 89）在武帝天漢 2 年（西元前 99）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在歸途中被匈奴重兵包圍，帶百餘壯士潰圍，身披二十餘創，名震匈奴。武帝親自在行宮召見他。這是武帝一生僅有的一次對有功將士的恩遇。另一件重要的事是趙充國宣帝神爵元年（西元前 61）自動請纓攻打先零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這場戰爭大約持續年半，他用兵的策略是以分化、瓦解方法誘降罕、開羌，孤立打擊先零羌，做到不戰而勝，收「全師保勝安邊之效」，並使漢、羌民族和睦相處。²⁶他在湟中屯田，也收駐守、墾荒、修整交通郵亭道橋之效。後來成帝時西羌有警，思念良將，追美充國，命揚雄（西元前 53-18）在畫像上題詞頌揚。揚雄概括趙充國的一生功績：「先零昌狂……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頁 4685）這段文字概括了趙充國一生的重要戰績：他熟悉羌務，打敗反漢主力的先零羌，安撫罕等羌族，鎮住西疆；堅持自

²⁴ 周承珩：〈不朽的愛國者形象——〈蘇武傳〉試析〉（《天津師大學報》1984 年第 2 期，頁 93-96）對〈蘇武傳〉刻畫蘇武的愛國形象進行論析，可參。學者多稱讚蘇武忠君愛國、盡忠敬職、堅守民族氣節等精神，張中行：〈讀《漢書·蘇武傳》〉（《讀書》1993 年第 5 期，頁 88-93）對蘇武對漢武帝之「忠」不苟同。

²⁵ 內地學界對趙充國的生卒年、籍貫、職任、屯田具體內容、思想等的研究甚豐，但有歧見，見康麗：〈國內趙充國研究百年述評〉，《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5 年第 4 期，頁 34-40。

²⁶ 張大可：〈西漢傑出的軍事家趙充國〉，《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2 年第 2 期，頁 97。

己抗敵的理念，屢次抗旨上書陳述已見。「營平守節」高度評價趙充國的高貴品德。²⁷

趙充國熟悉兵法，嫻熟《孫子兵法》。他在上書漢宣帝常引用《孫子兵法》。如他說：「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頁 4669）出自《孫子兵法·形篇》「守則不足，攻則有餘」。²⁸又如說：「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頁 4669），出自《孫子兵法·虛實篇》「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²⁹趙充國用兵的特點是謹慎，³⁰「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此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頁 4661-4662），打仗有周詳的作戰計劃（詳頁 4674），因此，他常常打勝仗。這樣，宣帝支持他。

趙充國重視家庭教育。他的兒子趙卬（?-西元前 60）也從軍，任右曹中郎將。趙充國主張屯田湟中，以困迫叛羌，可是他還沒把計劃上報就病倒了。宣帝沒徵詢他的意見就要派破羌、強弩將軍去圍剿羌豪。趙充國決心第三次抗旨上奏。這就嚇壞了趙卬，他派客人游說充國：「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堅持己見：「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以上引文見頁 4672）可見，趙卬孝順、忠君。趙充國的孫子趙欽嗣侯，娶敬武公主；曾孫趙伋為營平侯。一門四代都為侯，可見趙氏門風頗佳。

4. 辛慶忌父子

辛慶忌，本狄道（今甘肅臨洮縣）人，後徙昌陵。（頁 4689）他曾任右校丞、校尉、郎中騎將、張掖太守、光祿大夫、左營中郎將、執金吾、酒泉太守、光祿勳、左將軍等職。可見，他在中央、地方都任過職。有關慶忌的戰績，《漢書》本傳沒有正面描寫，只透過大將軍王鳳（?-西元前 22）說他「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頁 4687）丞相司直何武稱他：「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頁 4688）「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頁 4689），可見他在匈奴、西域中很有威信，這與他平素在這兩地域打勝仗有密切的關係。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衣著都很節約，只是愛好輿馬，這是他生活的唯一奢侈之處。

²⁷ 嘉瀨達男：〈論揚雄的〈趙充國頌〉〉，收於《〈文選〉與「文選」學——第 5 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351-360。曾討論本頌，指出揚雄奉成帝命而頌美的對象可能是趙充國及辛慶忌。

²⁸ 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頁 71。

²⁹ 同上註，頁 106。

³⁰ 趙充國云：「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頁 4673）

辛慶忌也重視家庭教育，他的三個兒子都從軍：長子辛通為護羌校尉，中子辛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辛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頁 4689）

5. 小結

綜上所論，可見這幾位將軍具有幾個特點：

- (1) 他們是由漢武至昭、宣、元時代英勇善戰的將軍。
- (2) 他們有的出身於軍人世家，大多重視家庭教育，他們的子孫多承先人之業，有的還熟讀兵法。
- (3) 他們大多熟悉邊疆事務，真正上沙場，過金戈鐵馬的生活，靠自己的戰功而升為將軍，而非靠姻親關係或一直居於廟堂之上運籌帷幄而獲封將軍的。他們對鞏固邊疆、鎮撫邊陲少數民族有著重要的貢獻。
- (4) 他們都沒有升到最高的將軍位階（大將軍、驃騎將軍等）。

（二）論班固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提到的將軍

西漢除了山西出了一批能征善戰的將軍外，山東也有不少將軍。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所載，封為「列將軍」的姓名及人數如下：

將軍銜	人數	擔任者	備註
將軍	5	酈商、韓安國、李沮、趙食其、任千秋	
大將軍	5	竇嬰、衛青、霍光、王鳳、王商	衛青、霍光、王商為大司馬大將軍
車騎將軍	12	薄昭、金日磾、上官安、張安世、韓增、許延壽、史高、王接、許嘉、王音、韋賞、王舜	張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勳及大司馬，韓增、許延壽、史高、王接、許嘉、王音、韋賞、王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舜為太保車騎將軍
驃騎將軍	3	霍去病、王根、丁明	霍去病、王根、丁明皆為大司驃騎將軍
衛將軍	6	宋昌、張安世、王商、丁明、傅晏、董賢	張安世、王商、丁明、傅晏、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左將軍	12	上官桀、馮奉世、王商、任千秋、史丹、辛慶忌、孔光、王咸、師丹、彭宣、丁望、孫建	馮奉世為左將軍、光祿勳
右將軍	25	王莽、張安世、霍禹、常惠、馮奉世、許嘉、王商、任千秋、史丹、王章、辛慶忌、韓勳、廉褒、尹岑、王咸、傅喜、彭宣、公孫祿、嶠望、王安、王崇、馬宮、甄豐、孫建、甄邯	王莽為右將軍衛尉，張安世、甄邯為右將軍光祿勳
前將軍	3	韓增、蕭望之、何武	
後將軍	2	趙充國、朱博	

將軍銜	人數	擔任者	備註
復土將軍	3	左咸、耿豐、左咸	
度遼將軍	1	范明友	
強弩將軍	1	許延壽	
步兵將軍	1	王駿	
祁連將軍	1	田廣明	

所記有將軍銜的共 80 人，剔除重覆的有 65 人。若按帝王在位時時期來分，則文、景時期 2 人（宋昌、薄昭），武帝時期 5 人（霍去病、金日磾、上官桀、衛青、霍光），昭帝時期 6 人（王莽、上官安、張安世、范明友、趙充國、韓增），宣帝時期 5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霍禹、許延壽、史高、常惠、蕭望之），元帝時期 6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馮奉世、許嘉、王接、王商、王鳳、任千秋），成帝時期 13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王章、王音、辛慶忌、韓勳、廉褒、尹岑、王根、朱博、孔光、王咸、師丹、傅喜、彭宣），哀帝（西元前 7-1 在位）時期 14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丁明、丁望、公孫祿、嶠望、王安、傅晏、何武、韋賞、董賢、馬宮、王崇、王舜、甄豐、孫建），平帝時期 2 人（甄邯、王駿）。

若按山東、山西兩大地域來分，則山東籍將軍的姓名、出生地／籍貫如下：

今山東省 15 人：

許延壽（昌邑），史高、史丹、韋賞（以上魯國），孔光（曲阜），許嘉（昌邑），丁明、丁望（山陽郡瑕丘），王咸（濟南），師丹、左咸、王駿、王崇（琅邪），馬宮（東海郡戚縣），蕭望之（東海蘭陵）。

今山西省 7 人：

衛青、霍去病、霍光、霍禹、尹岑（以上河東平陽），馮奉世（上黨潞），常惠（太原）。

今河北省 9 人：

竇嬰（父世觀津人），王鳳、王商、王莽、王音、王根、王舜（以上魏郡元城人），王安（涿郡廣望縣），甄邯（中山郡）。

今河南省 8 人：

酈商（陳留高陽），韓安國（梁國成安），傅晏、傅喜（河內郡溫），薄昭（父應為魏人），韓增（韓襄王後代），彭宣（淮陽郡陽夏），公孫祿（潁川）。

山西籍將軍的姓名、出生地／籍貫如下：

今陝西省 6 人：

董賢（雲陽），張安世、朱博（杜陵），耿豐（茂陵），田廣明（尹鄭縣），趙食其（祿祔，屬左馮翊）。

今甘肅省 7 人：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上官桀、上官安、趙充國（以上隴西），范明友（隴西），廉褒（襄武），辛慶忌（狄道）。

今四川省 1 人：

何武（蜀郡郫縣）。

《漢書》未明確記載出生地或籍貫的有任千秋、王接、宋昌、孫建、韓勳、嶠望、甄豐、左威 8 人，而李沮是雲中人，屬今內蒙古。

可見，從帝王在位時期看，出現在「列將軍」人數最多的是哀、成時期，武、昭、宣、元時各有 5、6 人（剔除重覆出現的）。這可能與哀、成時在位的時間較短，更換的將軍比較多，且不少將軍年齡較大，當了將軍不久就去世有關。

從山東、山西地域分布看，山東將軍共 39 人，佔六成；山西人 14 人，佔兩成強。如果從這一數字來看，則班固所說的「山西出將」說受到挑戰，甚至不能成立。但如上文所論，班固提出這個看法，是基於他所提到的幾位將軍多上沙場，靠自己的戰功而升為將軍的。實戰經驗是最重要的因素。〈百官公卿表下〉所記的將軍們，尤其是生活在元帝以至平帝的，大多沒有上過沙場。他們能任將軍，有不同的原因：

一是他們有的依靠外戚關係而任將軍的，如最有名的王鳳家族，其他如史丹（？-西元前 13）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許延壽（？-西元前 53）是宣帝許皇后的叔父，許嘉（？-西元前 28）是許延壽的兒子，傅喜（？-10）是傅太后的堂弟，傅晏是傅太后的侄子，丁明（？-1）是哀帝母親丁姬之兄。

二是有的是依靠父蔭的，如張安世（？-西元前 62）靠其父張湯（？-西元前 116）之蔭而被武帝任為郎官、尚書、光祿大夫等，後來被霍光（？-西元前 68）、宣帝先後任為車騎將軍、衛將軍。霍禹憑其父霍光之蔭而封為右將軍。

三是有的既依靠父蔭，又曾上沙場，如任千秋（？-西元前 27）、韓增（？-西元前 56）。范明友（？-西元前 66）生於「世習外國事」之家，³¹又是霍光的女婿，自己親征匈奴、烏桓而有功績。

四是有的不熟悉軍事，依靠自己的經學、名望而拜為將軍的，³²如蕭望之（？-西元前 46）、孔光（西元前 65-5）、師丹（？-3）、彭宣（？-4）、馬宮、何武（？-3）、左威、王駿（？-西元前 15）。

³¹ 司馬遷：《史記》，頁 1063。

³² 西漢後半葉很重視經學，舉凡為相者或為三公者，必多明經致用，否則很難勝任，任期也極短，參拙作：〈論班孟堅「山東出相」說〉，頁 171-175。

五是有的是得到皇帝寵愛，如董賢（西元前 22-1）是哀帝的男寵。

自武帝以來，真正上過戰場的有上官桀（?-西元前 80）、馮奉世（?-西元前 39）、孫建（?-15）、常惠、廉褒。朱博（?-西元前 5）則靠自己努力、朋友交遊而位至三公。

可見班固說「山西出將」是從曾經上沙場戰爭而建功的角度出發，而非純從有將軍銜的來說明。因為這樣，他對那些建功立業、對軍、國有貢獻的將軍，從軍事行動、建立軍功等方面為他們立傳，如屬於山東的衛青、霍去病、常惠、鄭吉、陳湯、李沮、張次公、郭昌、荀彘、路博德、趙破奴等，屬於山西的傅介子、甘延壽、段會宗、李息、公孫賀、趙食其；而那些依靠外戚、父蔭的就不從這方面來寫傳。

四、從自然、經濟地理論述出西出將之故

某一地區人材濟濟，且能對當代政治經濟文化有建樹的，則其地應當人文昌盛，歷史悠久，此於古時尤然。而人文歷史能昌運彌久，元元不息，也有賴當地經濟發達，以資運用；否則土瘠民貧，民不聊生，常常為口腹所役，哪有餘暇修業進學？何況古時簡策繁重昂貴，書寫不便，學術傳播極其不易，惟在師弟之間口耳相傳。以口耳相傳知識，費時糜力。山西多出將軍，其地除民風尚武勇戰外，經濟亦發達。查班固所提到的幾位實戰型將軍，都來自北地、安定、天水、隴西四郡。這四郡在現甘肅省東南部，屬於《漢書·地理志》所記的秦地。〈地理志〉記秦地云：

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頁 2820）

則秦地包括三秦（含關中平原〔內有長安〕）、³³河西（包括河湟）、³⁴隴西（在今甘肅東南部）、³⁵巴蜀，地域覆蓋今陝西、甘肅、四川三省。關中一帶，農業經濟發達，自古已然。巴蜀素有天府之譽，經濟亦佳。隴西

³³ 三秦指陝西中部關中平原咸陽以西、咸陽以東至黃河流域、關中以北陝西南部三地區，見毛曦：〈自然環境與三秦文化的地域特徵〉，《唐都學刊》1997年第3期，頁71。

³⁴ 河湟在今青海、甘肅交匯處，包括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見周宏偉：〈兩漢時期河湟地理環境探索〉，《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頁84；《辭海（中）》（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頁2379。

³⁵ 常霞：〈隴西郡歷史文化考辨〉，《絲綢之路》2011年第8期，頁33。

素為隴右政治、軍事、經濟中心，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國」、³⁶「四塞之國」³⁷之譽。下文分別論述四郡與關中這兩大地區的自然、經濟地理。

（一）北地、安定、天水、隴西四郡

先談四郡的土壤、氣候。四郡屬於〈禹貢〉所記的雍州。據〈禹貢〉記載，這一區域的土壤「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該區土壤為黃土，田畝經營已成為九州中最上等的。³⁸

四郡氣候溫潤。〈貨殖列傳〉說山西地區「（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³⁹竹子要生長快，生長量大，需要潮濕的環境，有充足的水濕，良好的排水，深厚肥沃的土壤。繡，是紵麻植物，其習性喜歡光和溫暖濕潤氣候，耐旱性弱。〈貨殖列傳〉又說：「燕、秦千樹栗」，⁴⁰栗是喬木果樹，它生長需要陽光，需及時施肥、補充水分。秦地有很多栗樹。《漢書·地理志》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頁2824）山地林木茂盛，說明水源（包括地下水）充足，氣候也溫潤，適合林山生長。反過來說，山林多，山林植被更能涵養林內水源，還能保持森林裡多樣的生態。山地多林、多竹子，都須有相同的氣候條件。可見，西漢時期山西四郡氣候溫潤，土壤深厚肥沃，水分充足。

次談四郡水系。據〈禹貢〉記載，雍州有渭水、弱水、涇水、漆、沮、澧水等。據《漢書·地理志》所記，渭水出於隴西郡首陽附近的烏鼠同穴山，流經隴西郡、天水郡而進入關中。⁴¹涇水發源於安定郡涇陽，「東南至陽陵入渭」；鹵縣有濯水；烏水出自烏氏，「出西，北入河。」（以上頁2661）北地郡有沮水、洛水、泥水等。可見，這四郡或是河流發源地，或有河水經過。

漢代重視修建水利工程，大多數的集中在黃河、淮河及漢河流域。⁴²武帝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⁴³通過開鑿河渠，引河水灌溉，滿足農作物生長的需要。西漢

³⁶ 張良之語，見司馬遷：《史記》，頁2044。

³⁷ 司馬遷：《史記》，頁2242。

³⁸ 原文及譯文見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737、752。

³⁹ 司馬遷：《史記》，頁3253。

⁴⁰ 同上註，頁3272。

⁴¹ 《尚書·禹貢》云：「導渭自烏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烏鼠，山名，在今甘肅渭源縣西南。參見江灝、錢宗武：《今古文尚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82。

⁴² 許倬雲著，程農、張鳴譯：《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06。

⁴³ 司馬遷：《史記》，頁1414。

王朝除了移民實邊外，還在這一地區修渠道。《漢書·匈奴傳上》說：「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頁 5643），即在今內蒙古河套平原至蘭州的河谷平原上修渠道、闢農田，發展屯田。

四郡的經濟模式是以農業、畜牧業為主。〈地理志〉說雍州「畜宜牛、馬，穀宜黍、稷。」（頁 2173）〈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⁴⁴羌指居住在今青海、甘肅一帶的族群。所謂「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此「關中之俗」是指秦始皇把內地貴族、百姓遷移於關中之前的民俗言，即〈貨殖列傳〉所說的「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百姓看重土地，不輕易犯奸作科。

四郡與內地相同，發展農業。從甘肅武威磨咀子 48 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木牛犁模型及陝西綏德王得元墓漢畫象石牛耕圖、陝西米脂漢畫象石牛耕圖等，⁴⁵可見牛耕已在山西地區推廣。學者根據居延漢簡的「代田倉」記載，認為代田法也已經在邊郡推行。⁴⁶

農作物方面，據許倬雲先生考證，漢朝最重要的是禾與麥。禾「很強壯，抗風，而且不需要很多水分——對於乾旱多風的中國北方來說，這是一種理想的農作物。」大麥、小麥可以在春、冬生長。西部邊疆軍事駐屯地的簡片把大麥、小麥、粟列為當地所種植的三種農作物。⁴⁷

四郡與上郡及河西四郡既有農業，也有畜牧業。這些地區自古以來以產馬、牛、羊而聞名天下。〈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⁴⁸〈地理志〉說「古涼州之畜，為天下饒。」（頁 2825）〈百官公卿表上〉「太僕」「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條顏師古（581-645）注引《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頁 880）可見西北地區出馬數量之多。《漢書·地理志》記北地郡有堵苑、白馬苑，苑是漢朝在邊地設置管理馬匹的機構。馬在軍事、交通、生活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行軍打仗及貿易方面。馬援（西元前 14-49）說：「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⁴⁹漢朝對匈奴及邊疆民族用兵，離

⁴⁴ 司馬遷：《史記》，頁 3262。

⁴⁵ 陳庚齡、田小龍：〈甘肅武威磨咀子出土漢代木牛車搶救性復原修復〉，《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0 年第 1 期，頁 77-78。林正同：〈從畫像磚、石看漢代農業經濟特點〉，《農業考古》1996 年第 1 期，頁 39。

⁴⁶ 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頁 136。

⁴⁷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90、92。

⁴⁸ 司馬遷：《史記》，頁 3262。

⁴⁹ 范曄：《後漢書·馬援傳》，頁 840。

不開馬。馬是打勝仗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匈奴渾邪王在元狩二年（西元前 121）降漢後，漢就在這一地區養馬，設置六牧師苑，非常重視這裡的畜牧業資源。⁵⁰養馬業遂蓬勃發展起來，包括擴大牧場及廐苑規模，提高馬匹飼養技術，改良馬種等，這增強了漢軍實力，使河西的亦農亦牧經濟模式更為加強。⁵¹

最後談一下這區的人口。自秦始皇以來，王朝對邊地採取「徙民實邊」措施。秦始皇 24 年（西元前 223）秦滅楚後，先後遷大姓、上官氏於隴西，26 年（西元前 221）遷王建於共（今涇川），36 年（西元前 211）「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⁵²漢武帝元狩 4 年（西元前 119）冬把關東受災的大約 72.5 萬人移居到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這次大規模人口遷移，「不僅救濟了東部遭受洪水的災民，而且有助於充實邊疆地區的人口。」⁵³大規模從內地移民到邊地，不僅增加這些地區的人口，而且帶來了先進的農具、農耕技術，更有利於推廣農耕。⁵⁴趙過（西元前 140-87）發明代田法及新農具，先在三輔區試驗，取得顯著的成果後，「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頁 1594）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隴西郡戶 53,964，人口 236,824；天水郡戶 60,370，人口 261,348；安定郡，戶 42,725，人口 143,294；北地郡戶 64,461，人口 210,688。可見四郡人口不少。

（二）關中

關中位於今陝西省中部，介於秦嶺與渭北北山之間，西起寶雞，東至潼關，因在函谷關（亦稱潼關）與大散關之間，故稱關中、秦中。漢代關中地區，氣候溫濕。〈地理志〉說：「有鄠、杜竹林」（頁 2822），竹子大多在暖溫濕潤的氣候下生長。學者指出，西漢前期氣候溫暖，年均溫度比現在高 1 度，年降雨量也比現在多。武帝之後，氣候波動。⁵⁵

⁵⁰ 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529。

⁵¹ 楊吉寧：《考古視域下的漢晉河西地區飲食文化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頁 18-20；徐水蘭：《漢代河西養馬業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14-37。

⁵² 司馬遷：《史記》，頁 259。

⁵³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27。

⁵⁴ 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頁 134。

⁵⁵ 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貴：《歷史時期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8 年第 1 期，頁 4；史念海、蕭正洪、王雙懷：《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1。

關中土壤主要為黃壤，不乾燥，適合農作物生長。〈貨殖列傳〉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⁵⁶關中平原在秦漢以前植被覆蓋良好，有大片的森林。〈地理志〉說：「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頁 2822-2823）可見這一帶有竹林、檀樹、柘樹，還有梅樹、桑樹。⁵⁷丘陵、山地的森林覆蓋頗繁茂。史念海先生（1912-2001）指出，所謂的「陸海」應包括關中之南那段秦嶺。⁵⁸

關中水系發達，大小河流縱橫交錯，形成所謂「八水繞城」，⁵⁹交通便利。又，〈溝洫志〉說「（鄭國）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頁 2867）⁶⁰這一區域土壤本來就肥沃，加上秦修鄭國渠，鑿通涇水，引涇水沖溉兩岸低洼的鹽鹼地四萬多頃，用以灌溉農田，既增加農田面積，又提高畝產量。

漢代重視水利灌溉工程，除了維修完善舊有的水利工程，還開鑿許多新的幹渠，如漢文帝時在鄭國渠上流南岸開了「六輔渠」，武帝時先後開鑿了白渠、漕渠、龍首渠、靈軹渠、成國渠、漳渠。漢帝還在陝南興建了山河堰、流珠堰、六大陂池。⁶¹渠道渠水不僅沖刷掉土地中的鹹性物質，還提供水源，擴大關中地區農田灌溉面積，提高農產量，且便於水路交通運輸。⁶²另，漢人在修龍首渠時發明了「井渠法」（類似現代隧洞豎井施工法），解決了由於明渠渠道易於崩塌而堵塞水道的問題，也收到減少出土量和加快工程進度之效。這是水利史上一項創舉。⁶³

漢代農民種植的作物包括穀物、蔬菜、其他經濟作物，五穀中最重要的是禾與麥。關中主要農作物是粟、麥、水稻。⁶⁴當時儲糧設施也多，不少

⁵⁶ 兩段文字分見司馬遷：《史記》，頁 315、3261。

⁵⁷ 根據《詩經》《史記》的材料指出關中有梅樹、桑樹。王鐵峰：《秦國富強及東併六國之地理條件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頁 33-34

⁵⁸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42-45。

⁵⁹ 八水指長安附近的涇、渭、灃、潯、灃、灃、灃、灃，「八水繞城」情況見趙銳：《兩漢關中地區自然災害與政府應對策略相互關係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 4。

⁶⁰ 《漢書》這段文字抄自《史記·河渠書》：「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史記》，頁 1408）

⁶¹ 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9年第5期，頁 136。

⁶²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108；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35。有關關中六渠的開鑿、路線，詳黃留珠、周天游著：《陝西通史·秦漢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 226-229。

⁶³ 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頁 136；黃留珠等：《陝西通史·秦漢卷》，頁 228。

⁶⁴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45。許倬雲根據武帝元鼎六年頒發的詔令「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認為水稻是畿輔地區的一種重要的作物。參見許

倉困容積大，且有良好的通風防潮作用，以備不時之需。⁶⁵關中又與中亞各國之間有物資交流，農民可獲得新的作物品種，如西瓜、黃瓜、大蒜、芝麻、葡萄等。⁶⁶

關中農民改進農耕工具、農耕技術及方式。從陝北米脂石畫像畫檢拾牲畜糞便積肥的情形，可見農民重視和利用有機肥。⁶⁷漢代肥料主要有綠肥和糞肥兩種。關中農民能把動物的糞便、骨肥、種子拌在一起，使種子即刻得到充分的養料供應，這是一種提高種子周圍土壤的好方法。⁶⁸武帝時趙過發明了耬車、耦犁。耬車能一次過把開溝、下種、覆蓋的任務完成，有省力、省人、生產效率高的優點。關中人也發明、使用形制大小不一的犁鏵、起著翻土成壟作用的犁鏡，牛耕日益普遍。⁶⁹趙過還針對舊的耨田法的弊端而新創了「代田法」、區種法，對農田進行休耕，有利於地盡其力，剛中的禾苗也起著保墒、抗旱、耐風的作用。⁷⁰他在關中及周邊地區推廣代田法、牛耕法。⁷¹

總而言之，關中土地肥沃，沃野千里，耕種面積大，水資源豐富，實施精耕細作，發明新農具，農作物品種較多，因此，歉收失收的情況較少，百姓生活比較富饒。⁷²

農業發展，手工業技術也改進。漢代關中的鐵器鑄造和加工都有較高的水平，冶鐵場所也明顯增多，因為農田墾殖、農業發展需要鐵製工具。⁷³

農業發達，農民喜好農業耕種，「其民猶有先王（指公劉、大王、王季、文王、武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⁷⁴社會安定，人口較多。關中是秦、漢之都所在地，除了本地原有的人口外，秦始皇 26 年（西元前 221）曾徙 12 萬戶富豪於咸陽，35 年（西元前 212）又徙 3 萬家於麗邑、5 萬家於雲陽。文、景推行與民休息政策，人口又不斷增加。漢帝為了保護帝陵，

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94-95。

⁶⁵ 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頁 137。

⁶⁶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96。

⁶⁷ 林正同：〈從畫像磚、石看漢代農業經濟特點〉，頁 39。

⁶⁸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103-104。

⁶⁹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121、129；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頁 135。

⁷⁰ 黃留珠等：《陝西通史·秦漢卷》，頁 231；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39-40。

⁷¹ 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頁 506。

⁷² 當然關中農業、土地也有其缺點而導致不同類型的災害，因此政府採取相應措施，參陳彥良：〈兩漢災害高峰期——天災、人禍與治亂盛衰的關聯性分析〉，《臺大歷史學報》第 57 期（2016 年 6 月），頁 47-116。

⁷³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60。

⁷⁴ 司馬遷：《史記》，頁 3261。

在陵區設國縣邑，並三次徙民。所徙的居民都是全國各地的豪傑、官吏、家產 300 萬以上的家族。除了徙民，關中外來人口增多，與陵邑制度的形成也有關係。每位漢帝即位，建立陵邑，把不少百姓遷徙到那裡。一些陵邑如茂陵就集聚了不少富翁，他們有經濟實力，在政治上起著重要的作用，⁷⁵而且使關中文化改觀，形成「五方雜厝，風俗不純」（頁 2823）現象。⁷⁶學者估計，這些人數若以西漢的一般人口自然增長率增加，平帝至元始 2 年（西元 2 年）可達 120 萬人。⁷⁷據〈地理志〉所記平帝元始二年的統計數字：三輔地區（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人口共 2,436,360 人。這一數字不是西漢關中人口的最高值，最高值應在武帝時期。⁷⁸據〈地理志〉記，當時全國人口共約 59,594,978 人，則關中人口佔全國的 4%。把關中人口與山東大郡相比，山東人口較多的有汝南（2,596,148）、潁川（2,210,973）、沛郡（2,030,480）、南陽（1,942,051）、河南（1,740,279）等，⁷⁹則關中人口比這些單個的人口大郡還多。可見，在當時人口最稠密的黃河中下流區域裡，長安及其陵縣還是人口最多之地。⁸⁰

關中的農業、商業、手工業發達，綜合表現在都市的繁榮。關中有名的都市有雍、櫟邑、咸陽、長安。咸陽、長安是政治、經濟都會。史念海指出，關中的自然資源、豐富的物產、眾多的人口、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的重要地位等，都使這些都會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咸陽和長安在全國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⁸¹

（三）小結

上文具述北地、安定、天水、隴西四郡、關中，土壤肥沃，水利興修，農耕技術改進，農作物品種多。關中人口稠密，都會較多，一些都會民庶富有，就有多種追求；人口稠密，易於傳播學術文化；又山西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人才輩出，終西漢一代，無世無之，多所建樹。四郡與邊疆為鄰，漢人自古就養成尚武風氣。在這種情況下，四郡多出實戰型的將軍，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理所宜然。下文從這方面來論述。

⁷⁵ 黃留珠等：《陝西通史·秦漢卷》，頁 223。

⁷⁶ 有關漢朝徙民於關中及關中風俗改變，參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頁 33-38。

⁷⁷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14。

⁷⁸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99。

⁷⁹ 牟潤孫：〈秦漢篇〉，收於石璋如等著：《中國歷史地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年），頁 8。

⁸⁰ 尚新麗：《西漢人口研究》（鄭州：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頁 72。

⁸¹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62。

五、以人文歷史地理闡述山西出將之故

上文從經濟、自然地理闡述山西農業經濟概況，下文以人文歷史地理詮闡山西出將之故。班固所列的實戰型將軍多來自北地、安定、天水、隴西四郡。這幾個地方地處今甘肅東南部、河西走廊的南端，接近關中。這裡是秦人長時期活動過的地方。秦人自商周時期就遷移到此地，他們既與戎狄雜處，受戎狄文化影響，又接受周文化；既有勇武善戰的特點，不斷與戎狄發生戰爭，在戰爭中不斷洗禮、壯大自己，又有善於吸收其他文化（包括周文化）的進取精神，形成秦獨有的文化特點。可見秦人深受戎文化、周文化影響，具有遊牧民族、農耕民族的雙重特點；秦不斷東進、遷都，進行文化建設、軍力擴充。先秦時期秦人發展史可說是河西、四郡、關中區域文化的集中反映，也從秦人發展史可見河西、四郡、關中的人文特點。⁸²筆者認為本節人文歷史地理方面從秦人發展史可以詮釋山西出將之故。

結合出土資料及傳世文獻記載，秦人應來自東方，屬東夷部族。⁸³武王克商後，周人誅戮蜚（飛）廉。據清華簡《繫年》記載，三監亂平後，一大批秦人被遷到隴東朱圉山（今甘肅天水市甘谷縣），⁸⁴他們過著耕、牧結合的生活，其後由禮縣（屬隴西西縣，今甘肅隴南）逐步向其東北的秦安、清水、天水一帶擴展。同時，秦人一邊看守周的西垂，一邊與周聯婚，以鞏固他們的地位。

秦人善於養馬，「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⁸⁵非子出自秦的大駱之族，初居於西犬丘（屬隴西郡西縣，今禮縣）。⁸⁶這裡周圍有很多戎狄部落，秦久處其中，很受戎人勇武之風影響。這影響、塑造了秦人好勇尚武的特點。⁸⁷非子善於

⁸² 秦文化具有周、戎兩種文化的特點，見王鐵峰：《秦國富強及東併六國之地理條件研究》，頁 44-47。

⁸³ 趙化成：〈秦人從哪裡來 尋蹤早期秦文化〉，《中國文化遺產》2013 年第 2 期，頁 45-47。

⁸⁴ 清華簡《繫年》：「成王伐商盍（蓋），殺飛（廉），西遷商盍之民于邽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頁 141-142。

⁸⁵ 司馬遷：《史記》，頁 177。

⁸⁶ 西犬丘有兩層含義，一為地區名，一為城邑名，應為今禮縣鹽關堡一帶，見趙化成：〈尋找秦文化淵源的新線索〉，《文博》1987 年第 1 期，頁 5。王國維〈先秦都邑考〉（《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529）認為西犬丘是在今甘肅天水市西南。看法與趙同。西犬丘屬隴西郡西縣。

⁸⁷ 夏毅輝：〈論秦國早期中的尚武傳統〉，《寧夏大學學報（人社版）》2004 年第 1 期，頁 26；張樂時：〈秦的政變與秦的「尚武」傳統〉，《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3 年第 3 期，頁 151-152。《詩經·秦風》裡有些詩篇歌頌戰爭，如〈無衣〉說：「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養馬，也說明當時秦社會處於游牧、田耕並存階段。非子被周孝王（約西元前 891-886 在位）封於秦邑，1978 年出土的秦武公鐘、鏄銘文記「賞宅受國」，李零先生解為周孝王「賞」非子予秦邑之「宅」，地在今甘肅清水縣東北。⁸⁸

秦久居西垂，與西戎為鄰，⁸⁹熟悉諸戎內部事務，與戎狄建立各種關係。周、秦在宣王（約西元前 828-782 在位）時曾組成聯軍攻打戎狄，秦莊公（約西元前 822-778 在位）從戎狄手中取回西垂（初犬丘），報了其父秦仲被西戎所殺之仇，被封為「西垂大夫」。製作於約公元前 800 年的不其簋也記載了此事，記秦伯氏（秦莊子的昆弟）奉周王之命追擊獫狁到「西」（西犬丘）。⁹⁰

秦人與西戎的關係複雜。三代以來，西北地區住了羌、戎諸族。戎人「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⁹¹勢力大，剽悍善戰，經常襲擾關中。當時秦的軍力遠不如戎狄，依靠與周人建立婚姻關係，以加強自己的實力，如秦襄公（西元前 778-766 在位）採取和親政策，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⁹²秦與戎為世仇，不可能把妹妹嫁給戎，豐王是周的貴族。⁹³金文不其簋、秦武公鐘、鏄銘文分別記秦莊公祖母孟姬是由周朝嫁來的、⁹⁴秦武公（西元前 697-678 在位）娶周室之女。⁹⁵雖然秦與戎為世仇，但雜居一起，秦受到戎狄文化影響，如甘谷縣毛家坪秦人遺址發現社會中下層人的屈肢葬、西首葬。學者認為屈肢葬是秦接受戎狄文化的例證：戎狄出於某種靈魂轉托的宗教信仰，死者屈肢成胎兒狀，西向隨太陽而去，以便靈魂盡快轉世。⁹⁶戰國時代東方游士或政治人物都批評秦與戎狄之俗基本相同，如朱己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⁹⁷商鞅（約西元前 395-338）說：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小序〉說「刺用兵」，可從側面看出秦人尚武。

⁸⁸ 李零：〈春秋秦器試探——新出秦公鐘、鏄銘與過去著錄秦公鐘、簋銘的對讀〉，《考古》1979 年第 6 期，頁 515。李氏指出，銘文中「受國」指秦襄公受平王賜岐西之地。

⁸⁹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討論〉（《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頁 181）給西戎的定義是「源於陝西西部至甘、青地區的一些族源相同或相近的畜牧或游牧部族的統稱。」

⁹⁰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 年第 9 期，頁 25-26。

⁹¹ 范曄：《後漢書·西羌傳》，頁 2869。

⁹² 司馬遷：《史記》，頁 179。

⁹³ 晁福林：〈論平王東遷〉，《歷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頁 14。

⁹⁴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頁 25-26。

⁹⁵ 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考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頁 15。

⁹⁶ 戴春陽：〈秦墓屈肢葬管窺〉，《考古》1992 年第 8 期，頁 754-755。

⁹⁷ 張清常，王延棟：〈魏將與秦攻韓〉，《戰國策箋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625。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⁹⁸雖然這些話都有偏見，但秦受戎狄文化影響則是戰國時山東人的共同看法。

西周晚期，西戎常常內侵，尤其是周室東遷後，西戎佔領關中，山西只剩下一秦國諸侯，秦陷入戎狄包圍之中，形勢險惡。秦、戎又常常發生戰爭。〈秦本紀〉記襄公 2 年（西元前 776），戎圍犬丘，秦人被打敗，世父被捕。文公（西元前 766-716 在位）不得不遷都汧邑。汧邑在瀘水上游，接近岐山，地處關中平原西部（屬司隸部，在隴西郡東北與司隸部交界處），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適宜建都。另，襄公因救周有功，與戎狄戰爭取得一次勝利，因此，平王（西元前 770-720 在位）「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⁹⁹《詩經·秦風·終南》也稱頌這件事。¹⁰⁰秦此時才立國。這是秦國史上一件重要之事，也是秦人以勇武打敗戎狄而取得的成果。

秦文公是秦國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一是他帶領秦的勢力進入關中，一是他進行文化建設。這與他的祖先不同：秦進入關中前多用軍事，進入關中後重視文化、禮樂、法制建設。他繼承其父襄公之志，4 年（西元前 762），「至汧渭之會」。汧在今陝西寶雞東南，屬司隸部。〈貨殖列傳〉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秦人在文公的領導下，勢力開始進入關中。文公 16 年（西元前 750），秦打敗戎狄，「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可見文公在這次對戎戰爭中取得勝利，他還收拾、安撫周朝遺民，把岐山以西土地收為己有，實現了其父未遂之願。文公重視學習周文化，13 年（西元前 753）「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設置史官。史官在周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起著繼承、傳承周文化的作用。¹⁰¹班固《漢志》還說道家出自史官。另外，文公 20 年（西元前 746）立「三族之罪」。秦重視刑法，可能因他們的祖先來自東方，與商人的關係密切，殷人重刑，¹⁰²秦深受殷商影響。

秦人勢力進入關中。秦人受周文化的影響很大，如在墓葬、葬俗、社會制度（如宗法制、昭穆制、世卿世祿制等）、宗廟祭祀、井田制、國野

⁹⁸ 司馬遷：《史記》，頁 2234。

⁹⁹ 司馬遷：《史記》，頁 179。

¹⁰⁰ 《詩經·秦風·終南》〈小序〉說：「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王先謙指出此詩是秦襄公秦民「敵（平）王所愾」。見程俊英：《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356。

¹⁰¹ 許兆昌：〈周代史官職官功能的結構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 年第 2 期，頁 81-86。

¹⁰² 蒙文通：《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 年），頁 230。

制、文字等方面都學習、模仿周人。¹⁰³呂大臨（1044-1091）〈秦公簋〉記秦公說「必宅禹蹟」，這是秦人入居關中、自視為華夏之列之語。可見，秦人以周文繼承者自居。¹⁰⁴一般來說，周文化以《詩》、《書》、禮、樂為中心，這四者是儒家的經典。秦人繼承周文化，自然繼承《詩》、《書》、禮、樂。不過，秦人重視的是經典的誦習，強調禮樂、《詩》、《書》的現實政治作用，秦穆公問由余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¹⁰⁵就可見一斑。秦人不重視儒學創新，所以秦國沒有聞名的儒家。但是秦國有不少儒者，這是秦始皇「坑儒」的一個背景。¹⁰⁶秦深受周文化影響，一直到商君變法之前，仍在政治、社會、經濟、風俗等方面保存周代制度。不過秦對宗法制、血緣關係沒有那麼重視。

秦德公（西元前 678-676 在位）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¹⁰⁷把都城搬到雍城，並命宮廷為「大鄭宮」，因周穆王（約西元前 976-922 在位）曾在這裡建了鄭宮、春宮兩座行宮，德公這樣命名可能是為了表示秦是周的合法封國，是岐西的合法繼承者、使用者。另，雍位於澧河上游的雍水附近，是關中富庶之區之一，且地勢高，東可控黃河，西可禦戎狄，地理位置優勝，成為秦國以後多年的政治中心。它是秦以後向東發展、進軍中原的重要都邑。

秦穆公（西元前 659-621 在位）即位後，一方面繼續學習、吸收東方六國（山東）文化，另一方面一直與戎狄進行戰爭，且先後消滅關中東部陸渾之戎、茅津之戎。¹⁰⁸又，秦想向東擴展，但其東邊是春秋霸主晉國。晉據有虞虢、函穀，也希望向西擴張勢力。秦、晉各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曾三次結為姻親之國，卻又有穀之戰、王官之戰。¹⁰⁹秦無法向山東擴張，只能向西擴展。秦穆公 37 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稱霸西戎，統一了關中、河西，結束西周以來多年的戎患。可見，秦與戎狄經過多年的戰爭，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這與秦的尚武、自強不屈、百折不撓的精神有密切關係。

¹⁰³ 喬鑫：《從出土資料看秦的文明化進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頁 17-18。

¹⁰⁴ 李零：〈春秋秦器試探——新出秦公鐘、鎛銘與過去著錄秦公鐘、簋銘的對讀〉，頁 515。

¹⁰⁵ 司馬遷：《史記》，頁 192。

¹⁰⁶ 有關經學與儒學的關係，錢穆堅持經學與儒學不同，詳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年），頁 509-512。有關秦國儒學發展，詳高華平、朱佩弦：〈論春秋戰國儒學在秦國的發展演變〉，《貴州社會科學》2015 年第 9 期，頁 10-11。

¹⁰⁷ 司馬遷：《史記》，頁 184。

¹⁰⁸ 沈琳：《秦國與戎狄關係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頁 25-26。

¹⁰⁹ 許全航：《從「秦晉之好」看春秋時期的秦晉關係》（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頁 23-54。

秦人尚武精神，到秦孝公（西元前 362-338 在位）時更加提高。秦孝公即位，銳意變法圖強，任用商君，以強國為目標，把秦國置於高度的軍事化基礎上，倡導功利思想，使秦國更成為以功利尚武為主導的侯國。¹¹⁰商君提出、重視軍功爵制。《商君書·境內》篇¹¹¹記商君提出的軍功爵：「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上爵上造，就為簪褭。就為不更。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而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卿。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¹¹²

由這段文字記載可見，軍功爵位制由低級而高級的次序是小夫、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客卿、正卿、大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大良造等十七級。這與其後二十級爵制不同，是因為軍功爵制在發展。¹¹³商君推行軍功爵制，是通過提高秦軍的社會地位、獲取特權而大大提高戰鬥力。從此以後，秦國尚武精神更加強烈，並把尚武精神轉為戰鬥精神，秦軍的戰鬥力大大提高，《史記》稱秦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¹¹⁴秦國在其後所參與的戰役，多勝少敗。蘇秦（?-西元前 284）在商君變法後到秦國，稱讚「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¹¹⁵指出秦人有「兵法之教」，可見當時秦人已熟習兵法戰陣之事，可見秦軍的厲害。

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前，曾把山東不同侯國的貴族遷移到山西一帶，如遷趙國卓氏、程鄭於巴蜀，楚上官氏於隴西，齊王建氏於共（今涇川）。遷移的地點包括臨洮、嚴道、隴西、上邽、天水等。¹¹⁶另分別遷徙一般平

¹¹⁰ 田延峰：《秦思想研究——以秦統一前的思想發展為核心》（西安：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頁 50-67。

¹¹¹ 《商君書·境內》篇應是寫於商君變法期間，見全衛敏：《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 192-199。

¹¹²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 114-118。

¹¹³ 朱紹侯：〈秦軍功爵制簡論〉，《河南師大學報（社科版）》1979年第6期，頁 30-32。朱氏根據孫詒讓的看法，認為「四更」乃「三更」之誤，三更為左更、中更、右更（頁 32）。

¹¹⁴ 司馬遷：《史記》，頁 2231。軍功爵制與秦軍戰鬥精神的關係，參熊梅：〈軍功爵制對秦軍戰鬥精神的培養〉，《濱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頁 12-14。

¹¹⁵ 司馬遷：《史記》，頁 2242。關於史記這條記載蘇秦說秦惠王，繆文遠說「蘇秦與秦惠王不相值」，且蘇秦說秦在惠王初位，當時秦未稱王。楊寬說這是蘇秦「早年最先游說秦昭王」。見韓兆琦：《史記箋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3961。

¹¹⁶ 有關秦移民的情況，參黃佳夢：《秦移民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頁 23-28。

民、有罪的吏民到邊疆，一些亡國君臣到其他侯國。隴西、上邽分別是李廣、李蔡與上官桀、趙充國的故鄉。始皇統一天下後，「徙天下富豪於咸陽十二萬戶」，¹¹⁷富豪多來自山東諸國，其中必有文學之士。雖然始皇未加重用，但是他們帶來東方齊、魯、楚等地的文化思想，對關中、四郡風氣產生影響，自不待言。

漢高祖即位，一仍秦舊，想強本弱枝，因此把山東諸豪族遷到諸陵。〈高祖紀〉記 9 年「冬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頁 102）〈地理志〉云：「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是故五方雜曆，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頁 2823）可見所遷徙的有世家豪族，決非普通的市井庶民。這群人有些對關中的風氣帶來惡劣影響。¹¹⁸遷徙到關中的當中必有好禮、文學之士，學習、繼承《詩》、《書》、禮樂，如丞相石慶（？-西元前 103）之父石奮是趙人，後從高祖入關，徙居長陵。石慶生於斯、長於斯，平居孝謹有名，深得儒教，終至為相，即為明證。

關中文教事業發達，傳統諸子百家書籍、思想，都有人傳承、發揚。關中為政教文化中心，對附近地區產生影響。

另外，由於秦人長時期在河西、天水等六郡活動，六郡人也尚武（很多秦人後代仍會生活在此區域）。〈地理志〉說：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轡〉、〈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諠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諠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頁 2824）

班固這段文字指出幾個重點，一是從地理、民俗指出六郡的民風「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李廣家族就是擅長射擊的。二是他指出在這種民俗風氣之下，六郡出了很多良家子。良家子出現在六郡，而不出現在關中，這與兩地地理、風氣有異有關。關中是首善之都，富豪巨賈多，其子弟未必能吃苦，肯學習射箭；反觀六郡自古與戎狄雜處，秦人進入關中

¹¹⁷ 司馬遷：《史記》，頁 239。

¹¹⁸ 這群山東諸豪族也有不少富賈、游俠，上以干朝廷，下以橫鄉里。他們對關中的風俗產生惡劣的影響。〈貨殖列傳〉說：「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司馬遷：《史記》，頁 3261）

前已養成尚武精神，流風遺澤，根深蒂固，成為這區域的集體無意識。三是此區域的將領們有勇有義，堪稱君子，符合孔子的道德要求。¹¹⁹另外，如上文所論，這一區域自古多出將領，存在軍事世家，深受社會尊重。李陵投降匈奴，「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¹²⁰相反，李氏若不投降，則「隴西之士居門下者」都尊重、追隨他們。

總括而言，秦人自周代就在山西（包括關中、六郡等）生存、發展，由於戎狄雜錯其中，且秦國最初力量較弱，常常處於被動。秦人沒有自暴自棄，反而從非子以來，歷代國君在進入關中前大多繼承祖先的傳統，好勇尚武，積極開拓，國力日強。自文公開始，秦開始轉敗為勝，打敗戎狄，又逐步向東發展，進入關中，繼承周文化，建設法制。商君變法，推行軍功爵制，更提高秦人的尚武精神。六郡地迫戎狄，民風高上氣力，喜歡射擊，修習武備，軍事世家存在。反觀關中，自秦始皇遷徙山東貴族，富豪奢靡，當然或有好學之士，傳播諸子百家知識，對宣揚兵法思想應有幫助。在這幾個因素影響下，六郡多出良家子，進而從軍，參與戰爭而獲封侯，晉身將軍，就不難理解了。

六、結論

本文從經濟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地理兩方面闡述班固「山西出將」說。本文先指出漢代山東、山西的地理範圍，西漢的山西即《漢書·地理志》所說的秦地。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贊〉裡提到的「山西出將」是特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言，其範圍比山西小。

從班固提到的幾位山西將軍及其家族成員的生平事蹟，可見他們的出生地（或籍貫）在四郡。他們都是武、昭、宣、元時期英勇善戰的將軍，大多熟悉邊疆事務，真正上過沙場，有豐富的實戰經驗，靠自己的戰功而升為將軍，但未能升到最高的將軍位階（大將軍、驃騎將軍等）。他們有的出身於軍人世家，絕大多數重視家庭教育，他們的子孫多繼承先人之職業，長大後從軍殺敵。班固從這一角度來論述他們。

班固提出「山西出將」說，應是他作為史家對山西出將這一現象進行觀察而得出的看法，而並非隨意提出的。他提出這一看法，應受到一些因素影響：一是他的先祖班壹（生卒不詳）曾在樓煩營生，其孫班長（生卒不詳）曾任太谷守（頁 6220），班固的伯爺班伯（西元前 44？-7？）「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頁 6222）。班固兩歲曾隨其父彪（3-54）

¹¹⁹ 班固引孔子之言「君子有勇而無誼為亂，小人有勇而無誼為盜」，是出自《論語·陽貨》。

¹²⁰ 司馬遷：《史記》，頁 2878。

避難河西。二是班固之弟班超（32-102）自四十二歲至五十六歲出征匈奴、龜茲、姑墨、疏勒、莎車，威震西域，可說實現伯爺之志。班固是崇尚武功的學者，近六十歲隨竇憲（?-92）征北匈奴。¹²¹可見，班固及其家族一直與山西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他很關心這裡的國防軍事，對山西的將軍比較措意。他在〈敘傳下〉稱讚武帝「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頁6268）、李廣「威動北鄰」、衛青「薄伐獫狁，恢我朔邊」（頁6289）。相對北方邊地而言，南方（包括東南兩越）的情況就截然不同。班固在〈西南夷兩越朝鮮傳〉批評西南夷兩越國君說：「皆恃其阻，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頁6306）。這幾個地區比較容易收平，又國祚短，如南越（今兩廣）為趙佗（?-西元前137）所建，傳五世九十餘年，到武帝元鼎4年（西元前113）即為郡縣。東越（今閩浙）漢初被分為兩個王國，國王分別是勾踐（?-西元前464）後嗣無諸（?-前192，封東越王）與搖（?-西元前185，封東海王）。兩王國也在武帝時內附為郡縣。又，東南西南對漢朝國防的影響時間較短，又地遠京師，叛者無甚大志，只想稱霸一隅。¹²²漢朝派往征戰的將軍先後有王恢（燕國人，?-西元前133）、路博德（西河人，生卒年不詳）；¹²³又有文臣如陸賈（約西元前240-170）、嚴助（?-西元前122）、朱買臣（生卒年不詳）等。而北方匈奴羌胡生活之地，迫近長安，又自周代以來不斷擾攘，長年入侵，漢朝花了最多時間、人力物力在對付這些民族事務。由於這些因素，班固重視山西軍事、將軍。

山西之所以在西漢中後期出現一批實戰型的將軍，這與山西的經濟、自然地理及人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從經濟、自然地理言，山西農業經濟發達，為當地百姓提供生活保障。關中、四郡土壤肥沃，氣候溫潤，興修水利，交通便利，農耕技術改進，農作物品種多，關中人口稠密。四郡又是農業與畜牧業的交匯帶，宜農宜牧，養馬技術高，馬匹繁多，為漢朝打仗提供充足的馬匹來源。

就人文歷史地理言，關中、四郡自周代開始，秦人就一直在此活動。秦人與戎狄雜居，雙方一直不斷發生戰爭，這影響、塑造了秦人尚武精神。秦自春秋以來，勢力逐步往東開拓。由西周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秦人一步一腳印，在戰爭中洗禮、壯大、發展起來的。秦一方面與戎狄戰爭，另一方面受戎狄影響，也受周文化的影響，進入關中後以周文化繼承者自居。秦

¹²¹ 侯文學：〈班固年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頁176-186。據〈班固年表〉，班固約五十一歲完成《漢書》，當時班超亦同齡。班超仍在西域，班固應關心山西軍事。

¹²² 如趙佗在秦滅亡時自立為南粵王，漢文帝派陸賈賜書，他「願奉明詔，長為藩臣」。

¹²³ 他倆屬於漢代山東人，其戰功不能與山西的趙充國、辛延慶等相比。

人這些特點，對四郡、關中都有影響。六郡民風尚好善戰，除了地迫戎狄外，顯然深受秦風的影響。秦始皇、漢帝把山東豪族遷到關中，他們有的深有學養，傳播傳統諸子百家知識，這對山西軍學思想、兵家知識的傳播起著重要的作用。山西將軍作戰能善用兵法，應與這一文化傳播、家教、歷史沉澱有密切的關係。加上武、昭、宣時用兵西邊，在這種情況下，四郡多出實戰型的將軍，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理所宜然。